



车子沿山路东去，我第一次踏上这片红色热土——湖北省红安县。时值初夏，苍松翠柏间不时进出几丛映山红。从岩石缝里挤出来、从荆棘丛中探出来的这一抹抹红色，仿佛当年红军的旗帜，在密林间若隐若现。

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巨大的黑色花岗岩墙面赫然入目。这是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墙面上方居中镌刻“140000”，代表红安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人数。数字下方，密密麻麻地铭刻着登记在册的22552名红安革命烈士的名字，其中有父子英烈、夫妻英烈、兄弟英烈、满门英烈。

走出纪念馆，我在石阶上遇见一位老人。已是鲐背之年的他指着山上的映山红，告诉我：“听我妈说，那年红军从家门口过，她把最后一床棉被剪了，一半用来给一名战士缝成两个绑腿，一半裹在我身上。后来，那名战士牺牲了，再也没回来。每年这花一开，我就来替他看一看。”

当地一位文化工作者告诉我，红安至今流传着100多首红色歌谣。“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从红安传唱至全国的。还有《黄安颂》：“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新中国成立后，“黄安”改名为“红安”，成为全国唯一以“红”褒奖命名的县。

他还告诉我：“在红安，红色用得最多、最巧、最别致。新娘的嫁衣是红的，孩子的肚兜是红的，过年贴的窗花是红的，就连端午节包的粽子，也要用红线扎上一道。这种红色崇拜在革命中得到升华。红安人眼中的红色，不只是喜庆和吉祥，更是牺牲和光荣。”

行至七里坪，长胜街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这条600多米长的老街，至今保持着鄂东传统建筑的面貌：青砖



红安革命烈士纪念馆上，铭刻着22552名红安革命烈士的名字。

新华社发

黛瓦，飞檐翘角，木门木窗。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指挥部、鄂豫皖苏维埃银行、七里坪革命法庭、列宁市经济公社等旧址，依旧保留着当年的建筑布局。

在七里坪，有一棵大槐树，树身伟岸苍劲，得好几个人围抱。树冠横斜，绿荫如盖。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这棵大树上曾经挂过一名革命者的头颅，被当地群众称为“英雄树”。1927年，共产党员程昭续参加黄麻起义，后任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大队长。他机智勇敢，在战斗中屡屡冲锋在前。后来负伤被捕，面对敌人许以高官厚禄的利诱，程昭续不为所动。敌人加以重刑，用刺刀顶着他的脖子相威逼：“你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随后，程昭续惨遭敌人杀害，头颅被挂在七里坪这棵槐树上。此后，每年程昭续的忌日，当地群众会自发来到槐树下祭奠，还将红绸布系在树干上，表达革命到底的决心。老槐树记下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历经雪雨风霜，仍傲然挺立，郁郁葱葱。

我走进一家老茶馆，老板娘端上一

碗“红军茶”。这不是什么名贵的茶，就是本地粗茶，汤色红亮。我问起从前的事，她说：“红安人以前嫁女儿，嫁衣上要绣一枝映山红的图案。革命年代，很多新娘子把丈夫送上前线。后来，有人把映山红图案绣在军鞋上、绑腿上。绣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这花命硬，石头缝里也能活，穿了这衣服、军鞋的人，也能活着回来。”说到这里，她往我碗里续了水，加了一句：“可真能活着回来的，不多。”

“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红安的红，化作山山忠骨、岭岭丰碑，沉实厚重，永不褪色。

在火连畈茶场见到王斌时，她正从茶山上下来，裤腿上沾着泥巴。这个90后女孩几年前还是大城市的白领，如今是知名的三农自媒体博主。她帮助家乡的农产品拓展销路，带领姐妹们一起致富，带动周边乡村劳动力增收。“我奶奶那辈人年轻时就是在这儿支起锅灶，给红军煮饭。今天我们在这片土地架上机器开直播，让全国人民尝尝红安味道。”王斌看了看身后的园子，笑着说道。

今年54岁的退役老兵罗绍长，用10

军被的筋骨

■蔡莉莉

叠军被。要叠出方方正正、棱角分明的被子，首要任务是打磨出被子的筋骨，使其“站有形，立会挺”。叠被子的功夫，一在腿，反复压摩折痕，直到棉花服帖；二在手，一寸一寸雕琢拐角，捏棱掐角。

起初我不服气，觉得这是形式主义。昨晚还裹着汗水睡得温暖的被子，凭什么天不亮就要折腾成一块“绿豆腐”？可当我在训练场上因动作慢了一秒被罚加练、队列里因眼神飘了一下被点名、紧急集合时因背包散架被所有人等待，我才渐渐明白那句“三分靠叠，七分靠整”的真正分量。

“叠”要下苦功。用膝盖一遍遍压，压到棉絮认了路、布料服了软；用指甲一道道划，划出笔直的折痕，像给土地开出沟渠。我们趴在水泥地上，额头贴着地，用腿压、用手捏、用手指一寸寸地抠。汗珠子砸在被面上，洇出深色的圆点。被子从软绵绵到硬邦邦，像一块生铁被反复锻打，慢慢有了筋骨。

真正让被子立得住的，是“整”。叠完之后一遍遍修：捋平褶皱，捏尖棱角，把凸起的棉花往里塞，把松垮的地方往里掖。班长走过来，两根手指拎起一个角轻轻一拽，整床被子就垮了。从头再来，心里恨得牙痒痒。后来才懂，她在教

年时间，把红安一片荒坡变成了拥有2000只鸡鹅、500头肉牛、4个种植基地的综合农场。望着满坡生机，他说：“你看我带的‘千军万马’，这么多‘兵’。现在虽然不穿军装，但骨头里那股劲，松不了。”

还有人把当年红军的救命粮——红安苕，做成粉丝、饼干、零食，成为农民的“致富粮”。

这些正在发生的故事，不再伴有铜锣和硝烟，有了新的战场——战场在直播间，在养殖场，在每一块被重新唤醒的土地上。

红色涓流也浸润着每一个来红安的人。我在长胜街遇到几个从武汉来参加红色研学活动的学生，穿着红军服，脸上满是新奇和感动。一个女孩对我说：“以前在课本上学历史，感觉很遥远。到了这里，走进那些老房子，看到那些旧物件，听当地人讲老一辈的故事，才真正觉得历史是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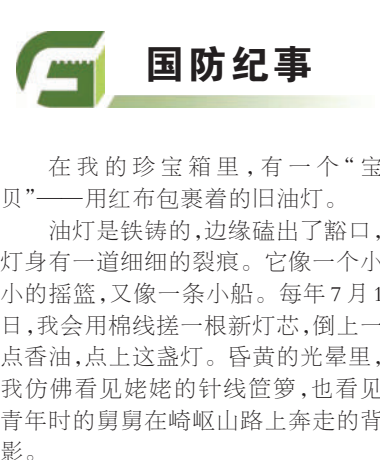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我在县城新区散步。宽阔的马路两旁新楼林立，“一河两岸”生态景观带绿树成荫。倒水河边，一群放学孩子从将军大道上跑过，书包拍打着后背，笑声清脆。我在路口站了一会儿，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从我身边跑过，又折返回来仰头问我：“爷爷，你也是来看将军爷爷的吗？”我点点头，问她：“你知道他们吗？”她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红安苕做的糖，递给我：“我们学校每个人都会背将军爷爷的名字。老师说，记住了他们，他们就没走。”说完，她又跑远了，小辫在夕阳下一甩一甩的。我攥着那颗糖，没舍得吃。当年，这座县城走出去61位开国将军；如今，孩子们也把脚步和记忆留在这条用信念和生命照亮的道路上。

在红安，我渐渐明白：红安的红，沉在地下，是烈士的鲜血，是14万个有名和无名的生命；长在地上，是红安苕、映山红和直播间里跳动的数字，是老兵返乡创业的汗水；刻在心里，是孩子们背诵将军爷爷名字的声音，是正在生根发芽的红色种子。

我们：差不多远远不够，经得起审视才算合格。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常常想起那床军被，想起它如何从一堆蓬松柔软的棉花，被反复雕琢成有棱有角的“绿砖块”。我终于明白，“七分靠整”，“整”的不只是被子，更是浮躁、马虎、差不多就行的侥幸；“整”出来的是耐性、标准，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那股韧劲。

一床军被，从松软到挺拔，从随意到规矩，正如一个青年从散漫走向自律，从稚嫩走向坚韧。那句“三分靠叠，七分靠整”，不光是叠被子的口诀，更是军营留给我的、一辈子都垮不掉的筋骨。



在我的珍宝箱里，有一个“宝贝”——用红布包裹着的旧油灯。油灯是铁铸的，边缘磕出了豁口，灯身有一道细细的裂痕。它像一个小小的摇篮，又像一条小船。每年7月1日，我会用棉线搓一根新灯芯，倒上一点香油，点上这盏灯。昏黄的光晕里，我仿佛看见姥姥的针线筐箩，也看见青年时的舅舅在崎岖山路上奔走的背影。

1943年7月，沂蒙山区一个叫青治行的村子里，舅舅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从此，我党领导下的民兵组织——沂源县联防大队多了一名热血青年。青治行，据说是因为商周时期曾有人在这里冶炼青铜而得名。它走过了青铜文明，却被战火烤得焦黄。鬼子的岗楼就扎在附近的山头上，日伪军的“扫荡”像潮水一样，隔三岔五就卷过村庄，留下一地的血光狼藉。作为一名抗日民兵，舅舅白天跟着大家在山路上埋地雷、放哨，夜里和其他民兵一起给八路军送信、送情报。

自从舅舅加入民兵队伍，姥姥家的油灯总是到很晚才熄灭。这盏铁油灯，是姥姥用5个鸡蛋向走街串巷的小贩换的，伴她度过很多不眠之夜。那时候，点油灯也是件奢侈的事情，鬼子的“扫荡”接二连三，老百姓吃油都困难，普通人真舍不得点灯。姥姥说，宁愿嘴里不吃，也要把这盏油灯点亮。

男丁上战场，村党组织号召妇女们为八路军做军鞋、磨军粮。姥姥陪嫁的被面、旧衣裳都拆了糊格槽，白天要下地干活，躲避“扫荡”，只有到了夜里，才有时间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去磨房磨军粮。这盏灯默默陪着她，火焰跳动，把她的影子映在土墙上。

油灯的光很弱，只能照亮不大的地方。姥姥的手因为常年劳作，布满裂口，纳鞋底的粗麻绳勒得指头上起了茧子，每一针下去，都要攥着劲儿。山区的夜里，姥姥一边纳鞋底，一边听着村外的动静。她不会写字，却会在鞋帮上绣“抗日杀敌”，这是在村党组织开办的识字班学的。她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哪支队伍，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吃上热饭，不知道他跑山路时穿的鞋合不合脚，只能把所有的牵挂都纳进一针一线里。她有时会想，军鞋送到队伍上，兴许会发到儿子手里。这时，她会再次用手里纳鞋底的针锥拨亮灯芯，心里跳动着希望。

抗战胜利后，舅舅成为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一名通信员。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打响。舅舅所在的华野四纵，是这场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在战役过后的日子里，一批批伤员下来，在村子里治疗养伤。姥姥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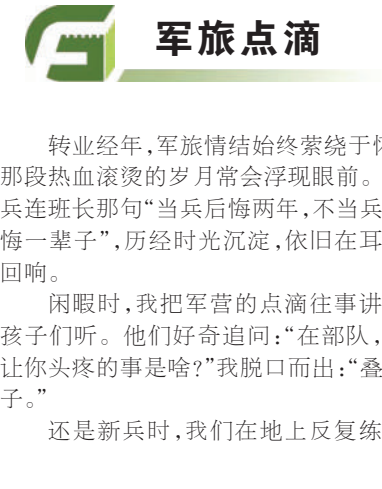
■张长国

坐在油灯下，一边给伤员缝补衣被，一边念叨着舅舅。偶尔，有战友捎来舅舅的口信，说他在部队一切都好，冒着枪林弹雨传递命令，跟着部队一路往前打。每天晚上，姥姥都会仔细观察灯芯，盼着它爆一束灯花——民间认为这是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如果有灯花爆开，姥姥会高兴很多天。

无数个夜晚，姥姥点亮这盏油灯，一边纳鞋底，一边对着灯影祈祷。直到舅舅从部队来信，捎来平安的消息，姥姥在油灯下听人念信后，第一次哭出了声……

后来，有了电灯，这盏油灯就被姥姥珍藏起来，时不时拿出来擦擦、看看。现在，这盏油灯传到我的手里。我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作为传家宝用心收藏。每当点亮它，在昏黄的灯光里，那些往事好像历历在目。它闪耀着一位母亲的牵挂、一名革命者的初心，也装着沂蒙老区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

这盏油灯，见证了过去的岁月。它的光芒照亮前路，在时间长河中、在我的生命里，永不熄灭。



转业经年，军旅情结始终萦绕于怀，那段热血滚烫的岁月常会浮现眼前。新兵连班长那句“当兵后悔两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历经时光沉淀，依旧在耳畔回响。

闲暇时，我把军营的点滴往事讲给孩子们听。他们好奇追问：“在部队，最让你头疼的事是啥？”我脱口而出：“叠被子。”

还是新兵时，我们在地上反复练习

他把“火炬”传给我

■丁擎宇

行山打日本鬼子了。你能在学校上学，很幸福啊。”

采访开始，已是鲐背之年的齐老将腰杆挺得笔直，打开了话匣子：“1925年，我出生在太行山脚下。小时候，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书可读。12岁，我加入儿童团，给游击队站岗放哨、送鸡毛信。19岁，就跟那个小伙子一般大的时候，我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到部队那一天我高兴坏了，光荣啊，可以真刀真枪打鬼子了。”

苦涩的童年，淬炼了齐老的乐观。他在战斗的洗礼中不断成长：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淮海战役、广西战役以及贵州剿匪战斗。

齐老没有讲太多自己的革命经历，更多地向我们讲起战友黄继光。1951年，他随部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和黄继光并肩战斗的那些日子，让他难以忘怀。

作为黄继光的入团介绍人，齐老回忆黄继光“浓眉大眼，个子不高，特别机灵”。1952年6月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副教导员齐润庭到六连炊事班检查工作。“当时，有几名炊事员在往前沿阵地送饭时负了伤。另一名个子不高、圆脸盘的炊事员向我提建议，说尽量摸清敌人火力封锁的规律，避开

封锁时间去送饭。”齐润庭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欣然采纳。

从炊事班回来后，齐润庭和教导员说起这名炊事员。教导员一听，说这个小伙子叫黄继光，是一名通信员，很不简单。

“我当时负责青年工作和后勤工作。1952年7月，在我的介绍下，黄继光和另外两名通信员入了团。”齐老告诉我们，黄继光是个闲不住的人，战友们对他的印象都不错。

一次，齐润庭在六连组织研究作战方案时，突然一枚炮弹在坑道外爆炸，炸断了与外界联络的电话线。黄继光二话没说，抓起一根电话线就冲出坑道，冒着枪林弹雨很快接好了线。

说到上甘岭战役中夺取597.9高地的战斗，齐老的声音低了下来。他望向窗外，我看见他的眼角闪动着泪光。

“连长，你是指挥员，让我去！我上！”说起黄继光主动请缨担负爆破火力点任务，齐老重复着这句话，声音陡然拔高，“当时，连长万福来看到零号阵地久攻不下，抓起手雷就要冲出去炸敌人的火力点。黄继光看见了，直接扑到连长胸前，主动请求担负爆破任务。”

“黄继光和吴三羊、肖登良组成爆破组，带着手雷准备出发。当时，黄继光在

坑道口回头对大家喊：‘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齐老嘴唇哆嗦着，右手慢慢掏出手绢擦眼泪。他的左手微微颤抖，下意识地抚摸着膝盖，像是在抚平一道只有他能看到的伤痕。

牺牲时年仅21岁的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以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

采访结束，屋外已漆黑一片。告别时，齐老拉住我的手：“孩子，你们赶上了好时候，国家强盛，没人敢欺负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和平是怎么来的。”

齐老看着我，眼里除了对孙辈的慈爱，还有没拭净的泪花。我对齐老说：“爷爷，咱们合张影吧。”

齐老满口答应。我挽着他的胳膊，镜头定格了珍贵的瞬间。

那次采访，在我心间刻下烙印。整理齐老讲述的故事时，我想起艾青的诗句：“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光荣属于前赴后继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坚定地选择投身国防事业，成为一名光荣的军队文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做好每一件事。

7年前齐老安详离世，我把他的嘱托一直铭刻于心。齐老把一支精神的火炬递到我手中，我要把这支火炬握得紧紧的、举得高高的。



青山依旧（中国画）

周新光作